



# 20 世纪上半叶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刘开军

**摘要:**20 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关键词:**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形与神;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711

**收稿日期:**2024-05-2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19JJD77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开军,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E-mail: lkjunshixue@163.com。

20 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但中国史学理论领域的发展样态却并非单纯划一。一方面,伴随着清末民初“东洋风与西洋潮的两面纠缠和夹击”<sup>①</sup>以及随之而来的“‘欧风美雨’的一卷天下”<sup>②</sup>,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也由此提出了不少新

① 葛兆光《自序》,葛兆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张广智《域外史学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回响》,《历史教学问题》2012 年第 1 期,第 67 页。

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这些理论大多比较新颖,得学术新锐之接纳,引领一时之风尚,影响甚大。另一方面,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汲取本土资源,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只是这些史家的声音曾被遮蔽,甚至被覆盖和遗忘,直到近年随着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sup>①</sup>,非主流史家研究的深入,才逐渐被发现与关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但它在某些区域或学术共同体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参与了当时的学术论辩,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一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举隅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不同于域外学术对中国史学的强力形塑,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社会与文化转型期的自我更新与嬗变。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似乎还是一个不太常见的提法。因此,择要举出几位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概要,借此呈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之一隅,当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陈垣以考据闻名于世。高明的考据家往往不止于埋首故纸堆中,而是常有理论创获,陈垣即是如此。他提出的“校法四例”(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史讳学和史源学,均经由具体的考证而上升到某“学”或某“法”,不限于考据技艺,而具有了理论品格。通观陈垣的史学,从实证出发,或得学术之类例,或究史料之源头,几乎见不到域外学术的印迹。“校法四例”是陈垣凭借整理《元典章》所发现的1.2万多条谬误衍脱,对“古籍窜乱通弊”作了一番探究,比一般文献辨证“更进一层”<sup>②</sup>提炼出来的。史讳学也是如此。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陈垣却变避讳之流弊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之工具,提出史讳学概念:“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sup>③</sup>《史讳举例》8卷82例,虽以“举例”为名,却不以“举例”自限,是通过举例表现理论。书中如“避讳所用之方法”、“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避讳学之利用”诸卷多有理论色彩,“因避讳断定时代例”、“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因犯讳断定讹谬例”以及“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诸条,若去掉“例”字,几与理论无异。

关于史源学是否可称为理论,1946年6月23日,陈垣在致陈乐素的家书中已有定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sup>④</sup>。他进而指出,史源学背后的学术支撑,是“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傲惕著论之轻心。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诬汝”<sup>⑤</sup>。史源学的核心,是对文献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精神,凡事必究其源,并在文献探源和史料批判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陈垣撰写的一系列史源学杂文,经得起考验,证明了这一理论的价值。

与陈垣同辈的史家中,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当推柳诒徵。柳诒徵围绕史学基本问题撰成的《国史要义》,是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史上的一部杰作。《国史要义》共10篇。其中,《史原》篇究史之起源,以礼论史,释传统史学重褒贬、讲笔法之因由,驳“就史言史者之失”,申明“吾史之原,迄今日未失其功用也”<sup>⑥</sup>,实为柳诒徵构建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史权》篇阐发古史之权高于一切以及史权隆替之迹;《史统》篇言说正统之义;《史联》篇论史家剪裁与编纂之匠心,于纪传体史书体裁的优越性辨析深刻;《史德》、《史识》、《史义》三篇畅谈子玄、实斋未竟之意,成一家言;《史例》篇表彰历代史家以例修史、论史之幽隐;《史术》篇论史学功能,认为中国史学“以儒术为之主宰,乃以开发建树此东亚数千年之世界”<sup>⑦</sup>;末篇《史化》最为切近时务,体现了柳氏以史经世的精神。总之,《国史要义》包蕴史之起源、历史编纂、古史家法、史家修养、史学与政治诸方面,出入经

① 郭震旦《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文史哲》2019年第4期,第142—154页。

② 陈垣《序》,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③ 陈垣《序》,陈垣《史讳举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7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④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46页。

⑤ 陈垣《史源学实习课程说明》,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页。

⑥ 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6页。

⑦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298—299页。

史诸子,又贴近时代思潮,张扬“史为政宗”之意<sup>①</sup>，“言史一本之礼”<sup>②</sup>，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著作。

陈垣、柳诒徵之外,刘咸炘在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的史学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刘咸炘在行辈上虽晚于柳诒徵,但二人实为史学同道。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屡屡援引刘咸炘的观点,多表赞同之意,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刘咸炘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八字真言“察势观风”、“史有子意”。王汎森指出,“‘风’是一个在近代经新史学洗礼之后长期被忽视的史学观念”<sup>③</sup>。在文明演进中,最具标识性的往往便是一时一地之“风”与“势”,而要观察“风”“势”,则需凭借史识,这构成了刘咸炘史学理论的重心。刘咸炘还认为,古今典籍不外史、子两类,因为“世间不过事与理。载事之书曰史,载理之书曰子。……事必求其理,理必著于事,子史亦不能划断也。史先而子后者,先实而后虚也。不论其世,必不能知其言也。荀卿长于礼,道家出于史,墨翟亦广征百国春秋,未有不由经、史而成子者”<sup>④</sup>,甚至诸子亦是史,“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sup>⑤</sup>。此即“史有子意”。可见,刘咸炘重事理,以史统摄四部之学。他进而强调史书要有诸子之意,“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也”<sup>⑥</sup>。在他眼中,《史记》就是一部有子意的史书。他曾指出,《史记》虽多“以人题篇”,实则“以事义统人”,“吾疏《伯夷传》,所谓先将一代事罗于胸中而分篇说之,一事为一篇,或数事为一篇,旁见侧出,数十篇书如一篇,非拘拘为一人立一传,非拘拘为一人备始末,此其所以上承二经(指《尚书》、《春秋》——引者),貌异心同,而有诸子之意”<sup>⑦</sup>。可见,他所谓的“史有子意”,是将子学引入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思想性,发展了古代的“史意”论。这层意思,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刘咸炘之外似无人论及。

刘咸炘的史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已得到蒙文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彭云生等人的高度评价,连平生不曾谋面的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也对他颇为推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其时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尤当强调的是,陈垣、柳诒徵、刘咸炘三家并非孤立无援的学术个体,他们皆具有学派之规模与气象。明乎此,对于评估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在 20 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的影响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陈垣执教于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诸名校,开设“史源学实习”、“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柳诒徵则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传道授业,学界素有“北陈”、“陈门四翰林”、“南高学派”、“南柳北陈”等说法。陈、柳二氏弟子广布,他们的史学理论与观念自然随之播撒,自不待言。倒是名气不如陈垣和柳诒徵的刘咸炘,其学说传布情形尚需略述。无论是地域位置,还是学术宗尚,刘咸炘都很符合“边缘”的标准,但“边缘人群并非是完全沉默无声,他们以各种形式的‘语言’宣称‘我存在’”<sup>⑧</sup>。

刘咸炘终生不曾出川,其学说影响范围固不及陈、柳,但双流刘氏一脉自清代中期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蜀地学术望族,门生故交遍及蜀中。刘咸炘不仅在敬业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而且在家族开办的尚友书塾中指导弟子长达 16 年。尚友书塾是传统的书院式讲学授徒之地,“学子大都为刘氏历代门人之子弟、亲友、故旧,或仰慕刘氏三代孝廉风范之士林子弟。其学生来源,不仅为成都附近郊县,更有远至省内边远州县”<sup>⑨</sup>。书塾中的学问传授以经史为本,史部除“前四史”、《资治通鉴》外,还推荐阅读《史通》、《文史通义》。书塾中的一部重要教材便是刘咸炘撰写的《浅书》,书中多谈“察势观风”、“史有子意”一类主张。刘门弟子多奉“察势观风”、“史有子意”为治史圭臬,尤以罗体基、李泽仁、陈华鑫、李克奇、赖天锡、刘开柳、杨致远等能传其学<sup>⑩</sup>，“请业诸生,论学诸友……皆文章相与倾慕而性道相与厚期”<sup>⑪</sup>,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已隐约形成一个学有宗旨的学术门派。可以说,

①柳诒徵《弁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②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附熊十力函》,第 1 页。

③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版,第 139 页。

④刘咸炘《浅书》,《推十书》(增补全本)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 页。

⑤刘咸炘《中书》卷 2《认经论》附录《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 43 页。

⑥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已辑,第 238 页。

⑦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已辑,第 236 页。

⑧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6 页。

⑨刘伯毅、刘器仲《成都尚友书塾史述》,《蜀学》第 2 辑,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26 页。

⑩关于刘咸炘的弟子传承刘氏学术,以“察势观风”之眼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可参见:刘开军《衣钵相授:刘咸炘与弟子们的学术养成》,《史学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49—56 页。

⑪刘咸焯《祭鉴泉二十四弟文》,刘咸焯代拟,手抄稿。

在尚友书塾内,刘咸炘构建起了一个完备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传习系统。刘咸炘还以书塾为基础,于1925年创办了《尚友书塾季报》,“仿书院总集、学校杂志之例,印行季报,以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期与当代学者共商榷之”<sup>①</sup>。由此而论,尚友书塾和《尚友书塾季报》就是一个传播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重要阵地。

以上所述,只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史上的荦荦大者,虽仅及陈垣、柳诒徵、刘咸炘三家,但借此亦可略知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之所指。至于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深层意蕴,则尚需探究其思想渊源、著述形态与话语系统。

## 二 思想渊源、著述形态与话语系统

由于时代原因,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20世纪上半叶史家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

柳诒徵对《国史要义》的学术渊源已有自评,“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蹶刘、章”<sup>②</sup>,表明他的史学理论根在六艺,源于《周礼》、《仪礼》,既要阐明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又要追随刘知幾和章学诚。从《国史要义》的内容和主张来看,柳氏所言不虚。陈垣从事史讳学的研究,深受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派的影响。正如他在《史讳举例》序言中所追溯的:有清一代的史家,如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赵翼等人,“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于是,他“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在自序末尾,他还特别注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sup>③</sup>。他对钱大昕再三致意,表明他的学术尊奉。若再追踪陈垣史源学的渊源,会发现这原本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降至清代,史学家不仅史源意识非常明确,探索史源的学术实践也相当丰富。浦起龙为《史通》作注,即声称“一依文返本,庶免举事不原所出之诮”<sup>④</sup>。邵晋涵评论《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sup>⑤</sup>。章学诚则称:“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sup>⑥</sup>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娴熟地运用追查史源的方法,考辨历代正史<sup>⑦</sup>。陈垣颇重赵翼之史学,早在1903年,已将《廿二史札记》分作“史法之属”与“史事之属”,从中揣摩治史之道<sup>⑧</sup>,留下了《廿二史札记校注》、《廿二史札记考证》两部专书。不仅如此,陈垣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使用的教材之一就是《廿二史札记》。由此而论,《廿二史札记》对陈垣史源学思想的提出无疑具有导引之力。

与陈垣的史讳学、史源学一样,刘咸炘的“史有子意”也有迹可循。中国古代史家从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sup>⑨</sup>开始,形成了言理的传统。刘咸炘“史有子意”更为直接的灵感,当来自章学诚评价郑樵的话:“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sup>⑩</sup>要知道,刘咸炘在学术上服膺的正是章学诚,所谓“吾族世传文史业,导师东浙一章君”<sup>⑪</sup>。此外,刘咸炘撰写《史体论》也渊源有自,用他的话来说,“言史体者,莫精于会稽章君”<sup>⑫</sup>。可见,实斋之学正是刘咸炘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根基。

①《尚友书塾季报略例》,《尚友书塾季报》1925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②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第1页。

③陈垣《序》,陈垣《史讳举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7册,第3、4页。按:钱竹汀,即钱大昕。

④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9《〈汉书五行志〉错误》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⑤邵晋涵《南江文钞》卷12《宋史提要》,《邵晋涵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5页。

⑥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9—350页。

⑦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9“《宋书》多徐爰旧本”条、“《齐书》旧本”条、“《梁书》悉据国史立传”条,卷13“《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条。

⑧陈垣《廿二史札记批注·题记》,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13册,第8页。

⑨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⑩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376页。

⑪刘咸炘《论学韵语》,《推十书》(增补全本)已辑,第106页。

⑫刘咸炘《史学述林》卷1《史体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379页。

这一时期,为学风格与刘咸炘有几分相似者,有浙籍史家宋慈抱。宋慈抱在学术上推尊晚清乡贤孙诒让(号籀廌),曾与梅冷生、周予同、戴家祥等人发起籀廌学会。宋慈抱熟知浙东史学,学兼文史,治史重义理。青年时代,他受冒广生、刘绍宽等人赏识,与夏承焘、李笠、薛钟斗等并称“永嘉七子”。宋慈抱的史学代表作是《续史通》。顾名思义,宋慈抱的志向是要承继《史通》,在史学上有一番作为。宋慈抱 19 岁时,王景羲指点他研读《史通》等书,“如婴孩得乳,乐而忘疲”<sup>①</sup>。宋慈抱赞誉刘知幾,“以耿介拔俗之操,为博雅传世之文,其行其学俱足称也”<sup>②</sup>。不论是“我欲《史通》置座右,续伸高义日星垂”<sup>③</sup>,还是“考史家之献,刘子玄《史官》及《正史》篇讨核详矣。今自《唐书》以后至《明史》之成,略述诸贤,用示多士”<sup>④</sup>,都明确表达了他要“续伸”《史通》之义。

史学论著的表现手法虽属外在形式,但当旧式体例逐步被其时流行的章节体取代之时,仍然选择用旧有的方式呈现自己对于史学的思考,则不能不说暗含着某种学术上的取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与宋慈抱的史学理论著作均不采用章节体,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表达。

刘咸炘的《史学述林》、《文史通义识语》、《四史知意》三本论著均沿用传统的编纂方式。《史学述林》共 5 卷 25 篇。为了说明问题,兹罗列篇目如下:卷 1 有《史体论》、《史目论》、《史体史目二论补》3 篇;卷 2 有《记注论》、《春秋》《国语》论》、《唐史记序》驳》、《南北史》家传释非》、《通志私议》、《考信论》6 篇;卷 3 有《史通》驳议》、《刘知幾家学考》、《宋史学论》3 篇;卷 4 有《考石文论》、《史学杂论》、《曾南丰》杂识》辑》、《八朝名臣言行录》评》、《编年二家论评》、《浦阳人物记》、《稗史》评 6 篇;卷 5 有《别史考遗》、《唐宋杂记论》、《唐语林》、《唐杂记目》、《史病论》、《华阳国志》论》、《重修宋史》述意》7 篇,诸篇体例颇合章学诚“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之说<sup>⑤</sup>。以上 25 篇文章辑为 1 册,名曰《史学述林》,可见刘咸炘对“史学”的理解。《文史通义识语》共 3 卷,前 2 卷抄录《文史通义》原文,缀以按语,类似于旧时学人的读史札记,末卷 4 篇为《提要》、《辨惑》、《别嫌》、《较新》,附录有《章实斋先生传》、《章氏遗书目录》两篇。《四史知意》一书是刘咸炘研读“前四史”的札记,每篇先录原文,继而摘录诸家之说,以按语为断,这样的体例安排比章节体更为灵活和随性。

宋慈抱《续史通》,原在《瓯风杂志》<sup>⑥</sup>上连载,虽属报刊文章,但亦效仿《史通》框架,分作内、外两篇。内篇有《惜马》、《斥班》、《尊欧》、《恨李》、《国志》、《晋纪》、《唐书》、《宋史》、《四通》、《学案》、《曲笔》、《浮词》、《表志》、《纪传》、《补述》、《方乘》、《载记》、《论赞》、《沿革》、《体例》20 篇,外篇有《考献》、《监修》、《模拟》、《创造》、《因时》、《度德》、《损益》、《毁誉》、《注释》、《评断》、《问刘》、《诘章》、《点烦》、《辨惑》、《政治》、《人物》、《疑信》17 篇。通观全书,《曲笔》、《浮词》、《论赞》、《点烦》4 篇篇名直接取自《史通》,《表志》、《纪传》2 篇篇名则是合并《史通》之《表历》、《书志》与《本纪》、《列传》篇名而成,其余诸篇之命名也沾染了《史通》之风。

以上不厌其烦地罗列诸书之篇名体例,虽显琐碎,但从中亦可见作者之意趣。只需将上述论著的形式、篇名,与 20 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新式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类著作,如罗元鲲的《史学概要》、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李则纲的《史学通论》等稍作比较,便能感受到它们的确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史学理论谱系。

话语既是学术的外衣,也折射学者的述学之道。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著述使用的语汇、文风,基本上延续了旧史学的概念与风格,同时也有一些发展。《国史要义》中的篇名,如《史权》、《史德》、《史识》、《史义》、《史例》都是传统史学的常见范畴;《史联》、《史化》则是根据旧史学而有所创新。柳诒徵还是一位以民族固有语言文字阐发史学理论的高手。他论道家与史学之关系,这样写道:“夫黄老之术何自而来?由古史而来也。其术之大,可以君人南面。即为将相,亦可临民柄国,名遂身安。观《汉志》之言,可以知黄老之术即史术矣。”<sup>⑦</sup>1923 年,柳诒徵的弟子刘揆藜在《史地学报》上连载《史法通论:我国史法整理》一文,分为《弁言》、《史学》、《史识》、《史体》、《通史》、《史限》、《详略》、《史才》、《史文》、《史德》、《自注》、《史论》、《史称》、《阙访》、《史表》、《史图》、《纪元》、《叙源》、《句读》19 目,语汇也多源于传统史学。

① 宋慈抱《王子祥先生墓表》,《瓯风杂志》1934 年第 10 期,“文苑”第 6 页。

② 宋慈抱《续史通·问刘》,《瓯风杂志》1935 年第 21、22 期合刊,“专载”第 21 页。

③ 宋慈抱《秋兴》,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卷上,民国年间印本,第 17 页。

④ 宋慈抱《续史通·考献》,《瓯风杂志》1935 年第 15、16 期合刊,“专载”第 1 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 1《书教下》,第 52 页。

⑥ 《瓯风杂志》1934 年 1 月创刊,陈謐任总编辑,宋慈抱、孙延钊、梅冷生等任编辑,其办刊宗旨为“阐扬先贤遗著,昌明故有永嘉学术,正俗解蔽而止于至善”(见创刊号“凡例”)。

⑦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 311 页。

1935年,宋慈抱作诗自述文章之道:“秉笔为文章,浑忘好与丑。骈也追庾徐,散乎宗韩柳。”<sup>①</sup>原来,宋慈抱欣赏的是庾信和徐陵的骈文,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此时,他正全力撰写《续史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续史通》表现出浓郁的旧体文章格调了。宋慈抱指摘前史,笔端不加掩饰,颇似刘知幾,如批评《汉书》,“取材比迁史为多,得书比迁史较易,而剪裁删削非其所长。其有军国大事、帷幄密谋、乱臣贼子之所为、艳妇娇妻之所误,当时曲笔,异代可以昭彰;公庭微文,私家不妨显豁。兰台反是,故遗恨尤多也”<sup>②</sup>。《续史通》行文辛辣尖刻,若谓“休文《宋书》,数盈百卷。夷考宋自刘裕践祚,刘准逊位,仅六十年。礼乐不足观,政治无可录。臣皆吠尧之杰,士多帝秦之雄。而百卷告成,成于一手者,何哉?盖实事非多,浮词尽录”<sup>③</sup>。经历白话文运动之后,这类文章还基本保持着一种传统史学的古雅之风。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们有意守旧,只是他们警惕于有朝一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国人可能陷入“难通古书,自失先人遗产,学何以进”<sup>④</sup>的境地。由此看来,话语既是形式,也关联本体。这里说到对待“先人遗产”,则又关涉到如何看待域外学术与本国史学的态度问题。

### 三 立场与态度

一般来说,思想立场往往决定学术态度,但学术问题繁赜曲折,有时又未必非此即彼、黑白分明,能够简单对应。在如何看待本国史学与域外史学方面,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群体内部虽存在个体差异,不尽相同,但总体基调尚属明晰。

第一,对域外学术,并非漠不关心,闭目塞听。

西学东渐,风潮强劲,在此情此景下强调本位、言说传统,似有自封之意和自大之嫌。然而,在中国史学史上从来不乏颠覆人们初步观感的事例。最近两百年间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古与今的对话、中与外的交融才是文化与学术演进的常态,生活于新旧交织时代的史学家,对域外的思想与学术自有一种会通中外的气度。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也吸纳新学。柳诒徵曾自述“旁览域外”,呼吁“今人论史,尤宜比勘外史”,他还认可进化论,认为“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盖缘西哲就生物之演变测人群之进步,而得此基本观念。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面对国内史学界对旧史的怀疑,他曾援引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话说:“斯宾塞尔既深讥爱国之偏,又历陈贬国之失,学者倘研阅其说,或亦可补刘、章、梁氏诸说所未备欤。”<sup>⑤</sup>可见,他不是墨守成规、拒绝西学新知之人。刘咸炘治学也注意吸收新学营养,他不仅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新学书籍,还托蒙文通、姚名达从北京代购新书<sup>⑥</sup>;在他的阅读书目里,不仅有经史子集,还有《新史学》、《历史哲学概论》,不只有孔、孟、马、班,还有达尔文、甄克思、詹姆士、杜威、杜里舒、柏格森、克鲁泡特金、稻叶君山;在他的藏书中,就有《东洋史》、《世界文化史》、《罗马社会史》、《西洋史学史》、《欧洲思想大观》、《西洋科学史》、《近世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底心理》等书籍;读他的文章,丝毫不会觉得他是因为不了解外部世界才坚守中国本位的学术观念。

第二,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

对本国学术的自信与敬爱是中國本位史学家的精神底色。近年整理出版的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为我们透视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对待旧史学的态度提供了珍贵史料。当读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sup>⑦</sup>、“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的两句话时,陈垣对前一句批下了“此何等语”四字,对后一句则以“久已十年”相回应<sup>⑧</sup>。如果说“此何等语”是委婉的诘问,那么“久已十年”则是明确的反驳,终归是无法认同那些对传统史学无情且缺乏学理的讥讽。

陈垣的认识在当时并非个例。柳诒徵也称:“近人谓吾史都似聚若干篇墓志铭而成,盖以《名臣碑传琬琰集》、

① 宋慈抱《乙亥三月晋郡承陈仲陶梅冷生招饮以诗答之》,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卷下,第26页。

② 宋慈抱《续史通·斥班》,《陋风杂志》1934年第2期,“专载”第6页。

③ 宋慈抱《续史通·浮词》,《陋风杂志》1934年第9期,“专载”第29页。

④ 刘咸炘《语文平议》,《尚友书塾季报》1929年第7期,第99页。

⑤ 以上引文,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第1页及第113、193、161页。

⑥ 关于刘咸炘请姚名达代购新书事,由刘咸炘哲嗣刘伯毅先生告知。1932年,刘咸炘病逝后,姚名达写信给刘咸炘遗孀,并寄回刘咸炘放在姚名达处的购书款,姚名达的信函后因时势动荡而下落不明。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9、27—28页。

⑧ 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2册,第168、140页。

《耆献类征》之类视史。若知史之镕裁辉映，迥与集录碑传殊科，不致发此论矣。”<sup>①</sup>柳诒徵的这番批评显然也是针对梁启超《新史学》里“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sup>②</sup>，有感而发。柳诒徵比较中外史学之后，不是看到中国史学的不合时宜，而是发现了“吾史之美”，认为那些轻视传统史学的人，不过是“徒以近百年间，国力不振，遂若吾之窳敝，皆受前人遗祸，而不知表章国光”<sup>③</sup>，是“拾其新说，病吾往史，则论世之未得其平也”<sup>④</sup>。类似的言论，在《国史要义》中还有不少，足证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敬意。1947年，年近古稀的柳诒徵在重版他的名作《中国文化史》时仍壮志满怀地写道，“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sup>⑤</sup>，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旧史学的自信，对自我学术使命的期许。

生活于学术中心，与主流史学界交流频繁的陈垣、柳诒徵尚且持这样的态度，长期居于非主流史学圈层的史家，面临旧史学被域外学说挤压的局面，反应自然更为激烈。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22岁的瑞安青年宋慈抱，发出了“欧化东渐，国粹中坠，莘莘学子，视旧法如弁髦”<sup>⑥</sup>的哀叹。这种文化的焦灼感在他的诗文里亦有反映：“经史湮沦脉望丛，不堪欧化异端攻。”<sup>⑦</sup>在与浙东遥遥相对的西南，尽管此时蜀地还相对闭塞，但刘咸炘也与宋慈抱有着相同的感受。面对“西来之风，侵削华化”<sup>⑧</sup>，目睹鲁滨逊《新史学》的风行海内，刘咸炘感慨不已：“吾国人轻其家业，好学而不深思，遂以为新耳。”<sup>⑨</sup>宋、刘二人并不相识，也从无沟通，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诉说了域外文化冲击下传统史学式微带来的阵痛。凡此，皆可与钱穆“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sup>⑩</sup>的名言相互发明，互为注脚。

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之名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也并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即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刘咸炘作《〈史通〉驳议》“以纠其违”<sup>⑪</sup>。即便是对章学诚，刘咸炘也撰写《通志私议》以“补章先生之未足”<sup>⑫</sup>，并在《续校讎通义》著作中设《匡章》篇，“举五条而匡正之”<sup>⑬</sup>。宋慈抱《续史通》中的《问刘》、《诂章》二篇，专门检讨刘知幾与章学诚之不足，并指出《史通》“尚多遗恨”<sup>⑭</sup>，章学诚“顾名忽实，舍近图远”<sup>⑮</sup>。这些批评，既是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对于本国史学的深刻自省，也是对时代丕变下中国史学如何前行的有益思考。

#### 四 中国本位与中国化

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换言之，中国本位是中国化的思想基点与学术前提。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就具有丰富的时代意涵。这一研究取向与学者提出的重访近现代学

①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19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按，梁启超并不是依据《名臣碑传琬琰集》等书作出旧史学是墓志铭这一判断的，但这不妨碍柳诒徵反驳梁启超的主张。

③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13页。

④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61页。

⑤ 柳诒徵《弁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3页。

⑥ 宋慈抱《墨庵骈文甲集·孙氏遗书总序》，1921年印本，第24页。

⑦ 宋慈抱《答张震轩桐丈》，宋慈抱《寥天庐诗钞》卷四，民国年间印本，第6页。

⑧ 刘咸炘《史学述林》卷5《重修〈宋史〉述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574页。

⑨ 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卷下《较新》，《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119页。

⑩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书首语》第1页。

⑪ 刘咸炘《史学述林》卷3《〈史通〉驳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59页。

⑫ 刘咸炘《史学述林》卷2《通志私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44页。

⑬ 刘咸炘《续校讎通义·匡章》，《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93页。

⑭ 宋慈抱《续史通·问刘》，《陋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专载”第22页。

⑮ 宋慈抱《续史通·诂章》，《陋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专载”第24页。

术史上“执拗的低音”有几分暗合,但也不尽相同<sup>①</sup>。

除了本文重点分析的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数人外,可归入这一史家群体的还有张尔田、陈汉章、钱穆、刘澹藜等人。他们提出的“察势观风”、“史源学”等观念与方法论,对今日之历史学研究仍有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启迪,足以证明理论不曾过时,只是研究者更换了门庭。常言道“与时俱进”,但需明白“时”中有“势”,而“势”又赅续传统,哪怕是一度式微的传统。唯有如此,“进”才有路。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也无意于将域外回响与本土延续对立起来、势同水火,这既不符合学术史的事实,也不合乎笔者对于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史的观察。同理,研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绝非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须知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不是复古主义者)。它只是表明从传统史学的土壤中可以生长出新的史学理论之花,并结出历史学的累累硕果。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构建者走的是温“故”知“新”的治学路数。刘咸炘、宋慈抱甚至没有接受过新式高等教育,是在非常传统的学术氛围中靠研读古代典籍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这固然不能说是他们的优长,但也不宜视为缺憾,或可算作这一史家群体的特点。毕竟,在20世纪上半叶留学生史家及其追随者占据着大半壁江山的史学界,这些土生土长的史学家们保持了传统史学的原汁原味。即便在国力衰弱、外有强敌的时代,他们仍不忘坚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传统中汲取理论资源,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坚信本土史学可以浴火重生;同时,他们还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指导下,撰著了一批达到一流史学水准的学术成果。因此,他们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回避的存在。

如果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是取域外之火种,点亮了中国史学的殿堂,察觉到了旧史学的诸多缺憾,并努力以域外学说改造中国史学的话,那么陈垣、柳诒徵、刘咸炘等人则是取法旧史,旁观新论,延伸着传统史学的轨迹。这提示着研究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上半叶,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的史学思潮竞争中,史家的选择并非唯一,而是在滚滚洪流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流。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之路是多元并进的,除了向西方看齐,还有继承传统和创新传统。在激进与保守、中学与西学相互纠缠的史学景观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群体的肖像,在近代史学史研究者视野中,曾一度变得模糊不清,但时至今日,又成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光影。如今的研究者已意识到,正是因为立足中国,取法传统,借鉴域外,中国史学才得以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行文至此,想到1935年。这一年或可算作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化建设方略大讨论的重要年份。是年初,曾因翻译和介绍鲁滨逊《新史学》而知名的何炳松,联合陶希圣、萨孟武、孙寒冰等九人,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开篇就疾呼:“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他们提出的文化建设方略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sup>②</sup>。近90年过去了,今时早已不同于往日。但那一代学人的宣言及其引发的争辩,分明还残留着历史的余温。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与振兴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责任编辑:凌兴珍]

<sup>①</sup>王汎森所言“低音”,指“被新派论述所压抑下去的声音”,“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维方式、观念等”,提倡“省视被近代学术及思潮一层又一层复写、掩蔽、遮盖、边缘化,或属于潜流的质素”(《序》,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1—2页)。这是富有学术启发性的论断。笔者和王汎森都把刘咸炘作为一个重要的典型性人物加以分析,并不谋而合之见,但“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与“低音”的意旨仍有差别。

<sup>②</sup>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5页。